

近 代 中 国

第十三辑

上海中山学社 主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近 代 中 国

JIN DAI ZHONG GUO

第十三辑

主 编 陈 绛

副主编(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凤麟 沈渭滨 易惠莉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克烈 沈祖炜 杨国强

徐元基 唐国俊 顾卫民

戴鞍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第十三辑/上海中山学社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7 - 80681 - 273 - 3

I . 近... II . 上... III . 中国—近代史—研究—文集 IV . 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4874 号

近代中国 第十三辑

作 者 上海中山学社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邹越非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20)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021 - 63875741

<http://www.sasep.com> E-mail: sase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375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



ISBN 7 - 80681 - 2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中山学社 主办

《近代中国》编委会名单

主任 厉无畏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克烈 毛增滇

过传忠 邹逸麟

目 录

纪念李烈钧、冯玉祥等辛亥先贤诞辰 120 周年

蔡锷将军：立志救民，与时俱进.....	李华兴(1)
蔡锷将军与上海及其“以道德爱国”思想.....	刘学照(5)
蔡松坡将军的精神遗产.....	陈 锋(9)
略论李烈钧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谢俊美(12)
略论“九一八”前后的李烈钧	廖大伟(16)
李烈钧将军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苏智良(19)
一个大写的人	熊月之(22)
——纪念冯玉祥	
冯玉祥与秘密会社	邵 雍(25)
李烈钧与冯玉祥的友谊	郭绪印(28)

纪念宋教仁先生遇难 90 周年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项斯文讲话	(32)
上海黄埔同学会会长李赣驹讲话	(36)
宋教仁的历史定位	沈渭滨(38)
宋教仁——头脑清醒的革命先驱	丁凤麟(43)
宋教仁对创造 20 世纪新中国的巨大贡献	刘学照(46)
坚韧不拔、光明磊落的宋教仁	陈 锋(50)
为彻底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而献身的	

民主斗士——宋教仁先生	易惠莉(54)
宋案的历史反思	谢俊美(57)
刺宋案与民初政治现代化尝试的夭折	廖大伟(60)
 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与民国时期国货运动 樊卫国(63)	
 清末民初人物研究 辛亥革命与赵凤昌 马铭德(97)	
试析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强势作为 ——以干涉姚荣泽案为例	李洪珍(112)
1903年张謇长崎之行新探	邵雍(122)
 思想与文化 论郑观应和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 丁凤麟(128)	
半截子的“维新派” ——评张之洞的《劝学篇》	齐国华(141)
 经济与社会 再论华盛纺织总厂 徐元基(154)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与发展 周秋光(189)	
20世纪30年代中国纺织技术人员对日本纺织业的认识 ——中国纺织学会与日本的关系	
[日]富泽芳亚著 朱婷译(234)	
“一二八”事变后六年间日本在上海的杂工业发展	
许金生(260)	
有关抗战前期西南地区农业发展与禁烟运动	

关系的认识 秦和平(276)

史料辑存

- 张焕纶与日本学者交往史料二则 易惠莉摘辑(301)
陈宝箴佚文(续) 柳岳梅 许全胜整理(305)

海外中国研究

- 韩国的中国观及其保守的历史 [韩]金希教(359)

书 评

- 探索农民理想国的新著 沈渭滨(371)
——《太平天国职官志》读后

学术动态

- “第六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 锐 羊(373)
“上海长崎交往”学术研讨会记略 易惠莉(375)
以近代城市史研究为重点编撰出版《重庆通史》 李宗杰(384)
《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出版 陆兴龙(388)
《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简介 冯雪松(390)

纪念李烈钧、冯玉祥等辛亥先贤诞辰 120 周年

2002 年是辛亥先贤宋教仁(1882 ~ 1913)、蔡锷(1882 ~ 1916)、李烈钧(1882 ~ 1946)、冯玉祥(1882 ~ 1948)和程潜(1882 ~ 1968)诞辰 120 周年。11 月 11 日，民革上海市委、上海中山学社、上海黄埔同学会在上海联合召开纪念座谈会。出席的有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民革上海市委主委、上海中山学社社长厉无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季晓东，上海黄埔同学会会长李赣驹，先贤后裔李赣骝(李烈钧子)、冯理达(冯玉祥女)、蔡顺慈(蔡锷孙女)、黄建(黄兴孙女)，以及蔡眸焱(蔡元培女)、蔡怀新(蔡元培子)、章念祖(章太炎孙)、杨小佛(杨杏佛子)等。台湾《展望》杂志社社长卜幼夫也应邀出席。座谈会由上海中山学社常务副社长马克烈主持。与会的上海历史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 4 位辛亥先贤的生平功绩和崇高精神。谨将部分发言刊载如次。

蔡锷将军：立志救民，与时俱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李华兴

今年是蔡锷将军诞辰 120 周年。

蔡锷，湖南邵阳人，原名艮寅，字松坡。蔡锷6岁入学，聪颖异常，13岁中秀才，16岁入湖南时务学堂，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少年时期，蔡锷即有“神童”之称，戊戌政变后，应梁启超之召，东渡日本留学。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秦力山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事败幸免于难，重返日本，投笔从戎，立志“流血救民”，自费进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并改名蔡锷，取其“砥砺锋锷”、拔刀而起之意。1902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习骑兵科，1904年毕业，名列第五。

在民国史上，蔡锷学书学剑，能文能武，足智多谋，赤诚爱国，是一位治军理政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惜乎英年早逝，只活了34岁。但是，生命的价值并不系于寿命的长短。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蔡锷将军却成就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高扬护国战争旗帜的青史永垂的伟业！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思想的精华和灵魂，也是蔡锷光辉而又短暂的一生的写照。

蔡锷曾经是维新思潮的信徒，改良主义的追随者，但却在民主思潮的熏陶和义和团起义的激励下，从维新转向革命。1902年，他在《军国民教育篇》这篇著名论文中敏锐地指出：“甲午一役之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蔡锷列举救亡图存的斗争，不仅歌颂了“振兴自上”的“戊戌变法自强之举”，“奋起自下”的长江一带的自立军起义，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还肯定了北方诸省的义和团运动，认为这场震撼大地的风暴，是中国人不堪外困欺凌，“忍无可忍”而“轰然爆发”的正义斗争。正是看清了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蔡锷成为维新志士转向革命阵营的先驱和典型。也正因为看清了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他在担任云南新军将领——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时，和同盟会保持密切联系，并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挺身而出，于10月30

日深夜发动云南起义,(史称“重九起义”),被一致公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亲身参加重九起义的朱德同志,在回忆录中盛赞蔡锷将军“是辛亥前后云南革命运动和起义的掌舵人”。

蔡锷将军言必信,行必果。他在担任云南军政府都督,负责云南军政大计,发表施政纲领时郑重声明:“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体”,“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当袁世凯信誓旦旦:“共和为最良国体”,决心“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中国”时,蔡锷曾被迷惑,对袁表示支持与好感;而当袁世凯背信弃义,帝制自为,暴露出狼子野心时,便举起了反对复辟帝制、捍卫民主共和的护国战争的旗帜,迎头痛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由拥袁到反袁,再一次显示了蔡锷与时俱进、顺应民心的伟人品格。

1915年8月,正当袁世凯帝制丑剧紧锣密鼓,筹安会六君子摇旗呐喊之际,梁启超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反对“变更国体”,抨击袁世凯及其御用工具筹安会之流,“在共和国体之下”,“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其后,更鞭辟入里地揭露袁世凯“右手持利刃,左手持金钱”,肆无忌惮地“伪造民意”。他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将袁世凯的阴谋诡计和丑恶面目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论发动护国战争,其文字宣传之功,无疑当首推梁任公。

但在“有军则有权”的北洋军阀时代,要粉碎帝制复辟,光靠笔杆子没用,必须动用枪杆子才能解决问题。因而,蔡锷顺应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在云南高举护国战争的旗帜,在全国打响护国战争第一枪,其“再造共和”的历史功绩,自当永垂青史。

起义之前,蔡锷与梁启超在天津密谋时便约定:“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称帝,次日,改国号

为“中华帝国”。12月22日，蔡锷在和滇军军官秘密会议时又慷慨陈词：“我们兴师讨袁，所争者为我四万万同胞的人格，而绝非个人权力地位之私。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12月25日，蔡锷联合云南将军唐继尧与国民党人李烈钧等，宣布云南独立，并被推为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向四川进军，在纳溪，泸州一带与“背叛民国之罪人”袁世凯所部鏖战数月。尽管“绝壁荒山二月寒”，但蔡锷“热血填胸”，矢志“挥刀杀贼”。袁世凯陷入全国反抗怒潮，四面楚歌，众叛亲离，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做了83天的皇帝梦，1916年6月6日一命呜呼，结束了自己丑恶的一生。袁世凯死有余辜，但遗憾的是，蔡锷将军却因身先士卒、军旅劳顿而突发高烧，喉头结核病急剧恶化。8月，不得不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职务，决定出国治疗。9月，蔡锷抵达日本东京，入住福冈大学医院治疗。11月8日与世长辞，终年仅34岁。死后，北京国民政府追赠蔡锷为上将军，并经国会决议，举行国葬典礼，长眠于长沙岳麓山。

“敢唱满江红一阙，从头收拾旧山河。”蔡锷将军虽壮志未酬，但浩气长存。总其一生，可用十六字盖棺论定，那就是：立志救民，与时俱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是蔡锷将军留给后人不朽的精神遗产。

蔡锷将军与上海及其“以道德爱国”思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学照

蔡锷将军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者，为创建民国和再造共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与上海有不少联系，至少曾 6 次来过上海。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经济中心。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中国人“假途于日”，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化，掀起了留学日本热潮。上海是留日学生行前的主要出发地和回国后的重要活动地。1899 年夏，蔡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但未住多久，甚至还未正式入学，即应已流亡到日本的原时务学堂老师梁启超之邀，于 7 月同唐才常等离沪赴日留学。1900 年夏间，唐才常决定发动自立军起义，蔡锷响应回国，经沪转汉。唐才常派他去长沙联络黄兴。唐起义仓促失败，蔡因在黄处得免于难。事后，他又转经上海再度去日。因此，1900 年夏间两次来到上海，都只是匆匆路过。

蔡锷第四次来上海是在 1904 年。这年冬季，他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回国抵沪，约停留 3 个月。其间有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参加杨笃生、章士钊任正、副会长的爱国协会（华兴会外围组织）的一次聚会；一是黄兴邀集杨笃生、章士钊、仇亮、陈天华、杨度、蔡锷、仇鳌等人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 8 号华兴会机关部开会，决定分途运动军队和学界待机起义。旋黄兴涉嫌被捕入狱，蔡锷自沪赴苏北泰兴向龙璋求援。后赣抚夏之时来电，以与黄同案

的郭人漳系江西新军统领，援手解救，黄乃得随之出狱。这两件事均表明蔡锷与其同乡人革命组织华兴会有过密切联系。此事过后不久，蔡锷就离开上海，先去长沙，后又去广西，并于 1910 年 7 月任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同年 11 月去云南，任云南新军三十七协协统。武昌起义后，他与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等密谋重九日（10 月 30 日）在云南起义，被举为云南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任职。1915 年夏秋，袁氏帝制自为甚嚣尘上，蔡锷乃于 11 月离京去天津治病。19 日自天津潜往日本，再坐船经上海去香港，转河内，于 12 月 19 日到昆明，旋即发动了护国军起义。

蔡锷第六次来上海在 1916 年 8 月。其时袁世凯已在全国讨伐声中病死。蔡锷时任四川督军兼民政长，因喉结核病情加重，于 8 月 9 日离成都东下，28 日晚到上海，住入医院。9 月 9 日转赴日本就医，黄兴亲往码头送行。9 月 14 日，他住入日本福冈九州大学医院。10 月 31 日，黄兴逝世于上海。蔡锷闻耗在病床上作挽联，于 11 月 8 日寄到上海时，他自己却在当日与世长辞。他遗电云：“现在各派意见多乖，竞争权利，望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蔡锷将军终年仅 34 岁。他短暂的一生实践了自己“以道德爱国”的思想。第一，他出身清寒，自读书后逐步树立了中国传统志士仁人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他为官一向克己奉公，廉洁自律。1899 年春到上海时，身边只有 120 枚铜钱。1901 年在日本与杨笃生等创设编译社，后又与同志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1902 年，他撰《军国民篇》，激励国人要有“国魂”。1907 年在给友人信中说：“可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于办事大有效力也。”辛亥后任滇督，提倡节约，以身作则，撤换了一批只想做官发财的县知事，起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他还规定，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 60 元津贴，造成了刻苦、朴实、清廉的新风气。自己暇时常至讲武堂训话，一日述及幼年贫苦，动情之处，诸生为之泪下。

第二，他为官有为国民之“公仆”的思想。他受任滇督，在蒙自军政警各界欢迎会上说：“夫共和以人民为主体，譬之一家之主人翁也。为公家服务者，则为公仆。仆从而负主人之委托，不克称职，是为不忠。”又说：“和衷共济为共和国之真精神……廉蔺相下，则秦兵不前；洪杨交哄[讧]，而大业以坠。……愿与诸君共勉之。”他立志做国民“公仆”，坚持“共和国之真精神”的政治道德，难能可贵。

第三，他矢志为国，大智大勇，为创立民国和再造共和立了大功。朱德在《辛亥回忆》一文中说：“云南是辛亥起义后首先响应的省份之一”，“云南革命运动，当时是由蔡松坡、李根源、罗佩金三位共同领导的。尤其使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当时的蔡锷将军。”“他是辛亥前后云南革命运动和起义的掌舵人”。1911年11月，黎元洪通电主张建立联邦政府，蔡锷以联邦制度非我国国势所宜，应建设完全统一国家，建立民主立宪政府，并致电争取各省都督一致主张。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他对挚友说：“我们自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格起见，非拚着命去干一回不可。”后来，他为躲避袁的耳目，于深夜化装上了停靠天津的日本运煤船潜赴日本，到神户当晚即离开日本，并事先写好几封信陆续由在日友人发出给袁的亲信，以迷惑袁世凯。及至云南，宣布独立，打破了袁世凯的皇帝迷梦，诚如孙中山所说：“民国之名词，乃得绝而复苏。”

第四，蔡锷将军胸怀坦荡，真诚待人，以国事为重，无门户之见，在辛亥前后广泛联结爱国力量，是革命党人同梁启超立宪派、进步党人联系的纽带。梁启超是他在湖南时务学堂的老师，一生关系密切。他与黄兴友谊也很深，1910年到云南后，又与同盟会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结为亲交，一起发动昆明起义。护国战争中与革命党人李烈钧分任一、二军总司令，共同讨袁。为此，他逝世后，李烈钧撰写挽联，有句云：“伤心万里，望穿蓬岛哭将军”，

真挚动情。正因为蔡锷一生胸怀坦荡，凭定自己的道德良心作事，联结各方面爱国力量，这是他能够树立不朽的历史功勋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他立心为公，不居功自傲，常存功成身退，为世作楷模之想。早在 1911 年春去云南时，即有“淡退”的思想。在护国战争高潮中，他在家书中写道：“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伤心惕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稍定，即当抽身引退。”袁世凯死后，他在给唐继尧电文中说：“而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惟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蔡锷将军这种从政为公、功成身退的政治道德实足“为后来留一榜样”。

蔡松坡将军的精神遗产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 锋

辛亥革命杰出的人物宛如灿烂的群星，划破封建皇朝千年沉沉的夜空，迎来新生共和国的黎明。蔡松坡将军是这群耀眼的星星中光芒四射的一颗。他在 34 年的短暂一生中，为推翻封建帝制，缔造民国共和，树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一代名将，两次起义，生前得到同时代人的热烈赞颂，身后更赢得了世人的永远追思和无限崇敬。

蔡松坡将军留给后人丰富的精神遗产是多方面的，而最值得珍视、最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是他一生孜孜不懈追求光明、追求祖国富强的无私奉献的赤子血诚。早年的蔡松坡目睹清廷腐败，列强侵凌，山河破碎，国事蜩螗，便萌发“张国势、复国仇”的志愿。1900 年他 18 岁，写下《杂感十首》述志遣怀，他写道：“中原生气戕磨尽，愁杀江南曳落河”；“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这一年他自日本回国，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军，准备在武汉策动反清武装起义。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殉难，在血腥镇压面前，他不但没有退却，反而更加坚定了“流血救民”的决心。1902 年初，他在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以“奋翮生”笔名，发表《军国民篇》，迫切呼吁：“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他不但鼓吹尚武精神，以救治中国的积弱，而且身体力行，弃文习武，年底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羸弱的身躯，经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满怀豪情地表示：“大丈夫当视国如家，努力进行，

异日列吾国于第一等强国之列，方不负此七尺躯也。”1904年底，他在士官学校毕业后返国，很快便加入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同月30日深夜，他与滇军中革命党人在昆明发动云南起义，众望所归，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起义成功，又理所当然地出任新成立的云南军政府都督。

蔡锷早年投考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结交谭嗣同，醉心于变法维新。他于1899年第一次东渡日本留学，便是应梁启超之召。但是他顺应历史的潮流，从维新走向革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武装起义的实践家和领导者。民国成立后，他曾经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以为袁能将中国引向富强。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发出贺电云：“共和成立，五族大同，此后经纬万端，责任尤巨。公闳才伟略，群众所归。”他奉召入京，出任总统府军事处参议等职，期望争取袁世凯的支持，对付列强的侵略。袁世凯则慑于他的才干和声望，想用功名利禄笼络他，在他的生日馈赠厚礼祝寿。但是他一旦看到袁世凯接受“二十条”，就在参政院发表演说严厉抨击；一旦识破袁世凯篡国称帝的野心，便义无反顾举起护国军义旗，武装讨袁。当他还在北京被袁世凯幽禁之时，严复于1915年7月10日写信告诉梁启超：“松坡现仍处笼中，虽朝夕过从极尽奉承之能事，然英雄之身可系而志不可夺。项城之意，愚之甚矣。”既笑袁世凯枉费心机，更赞蔡锷意志坚定。一个月后，蔡锷摆脱了袁世凯监视，潜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反袁。

蔡锷反对袁世凯帝制，不避艰险，维护了共和，并且最后为之献出了生命。1916年秋，他因喉痛加剧，病情恶化，请假治病。8月上旬，在离成都顺江东下，经上海转赴日本前，赋诗《别望江楼》云：“锦江河暖溅惊波，忍听巴人下里歌。敢唱满江红一阙，从头收拾旧山河！”短短几句倾吐了眷恋故国的缱绻情怀和振兴祖国的热切企望。这时离他辞世只有三个月。10月31日，他在日本福冈医院获悉黄兴在上海病逝的噩耗，抱病写了沉痛的祭文，他想到今